

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的影响分析^①

汤兆云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泉州, 362021)

摘要:目前大众传媒关于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作用的描述形成了“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媒介现实;但学界研究却发现“作用有限”。通过对557份调查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先赋性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的解释力不强;在所有的先赋性社会资本的变量中,母亲学历、母亲职业对大学生职业获得的解释力要强于其它变量;如果以努力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先赋性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的解释力增强一些。

关键词:先赋性社会资本 职业获得 媒介现实 解释力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科尔曼,1990:330)。从获得的方式看,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先赋性社会资本和自致性社会资本。“先赋资源(社会资本)是与生俱来的,如性别和种族,……是被继承限定的,如等级和宗教,还可以包括父母的资源。”(Lin Nan, Walter M. Ensel, John C. Vaughn: 1981)社会资本是外在于个体的一种资本形态,是关系网络中的共有财产,它“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发生作用”(周玉,2005:245)。由于家庭背景是人们的 social network 基础,构成个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当一个人的 social network 被运用于工具性行动^②时,其职业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的 social network 资源,而他的 social network 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他的先赋性社会资本(Lin Nan, Walter M. Ensel, John C. Vaughn: 1981)。也就是说,先赋性社会资本与职业获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么,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联系的强度有多大?本文在对大众传媒报道、学术研究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利用2009年下半年在河北省S大学进行的557份调查问卷数据,定量地分析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媒介现实:先赋性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发挥关键作用

职业获得作为大学生的一种工具性行动,先赋性社会资本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肯定不能被低估。但两者之间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目前大众传媒关于大学生职业获得报道的描述。以下略举数例作说明。

(一)2007年5月31日《江南时报》发表“六成研究生认为就业靠关系”为题的文章(黄进、徐锐,2007)。文章引用2007年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所做的一项为期一年的全国研究生学习、生活状态大型调研数据(N=7836)。文章的结论是:有61%的被调查者把“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作为导致自己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先赋性社会资本对他们的职业获得发挥重要作用。

^① 本文得到第4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20090450048)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② 工具性行动(又称目的性行动)是指在比较、权衡各种行动以后,行动者选择一种最理想的、获得资源的行动(如职业、职位获得);与之对应的是表达性行动。

(二) 2008年6月19日中国教育新闻网在发表的“大学生就业靠‘关系’护驾”为题的文章中说：随着大学统招生逐年增加，就业的压力也不断增大，找工作要靠“关系”护驾的说法，在校园里得到不少学生的赞同。以前人们有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已经变成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找工作要靠关系，尤其是靠父母家人，在大学毕业生的意识里，已经是一个常识。他们认为：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就越强，“大学生就业就是比爹！”^①

(三) 2007年7月某网站在发布的2007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联合进行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时，是以“大学生就业：不靠关系你能找到工作吗？”为题进行报道。文章说：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等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体现了一个家庭的资源。文章还专门列举了重庆市2007年大学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数据：近半数大学生认为最有效的就业方式是靠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在“你认为最有效的就业方式”的调查中，44.82%的被调查者认为最有效的就业方式是通过家庭、个人社会关系和找熟人；其次才是通过人才机构举办的招聘会、个人自荐、学校组织的就业推荐活动，其分别只有17.11%、15.18%、14.97%。^②

(四) 2005年8月1日《中国青年报》文章说：家庭背景越好，越容易找到好工作，这已成众多大学毕业生的共识。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子女工作的落实率和升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子女工作落实率和升学率均低于平均水平；而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0个百分点。因此，父母学历高、职业好，会让子女在教育和就业上更有利，这种“代际传递效益”非常明显；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李斌, 2005)

(五) 2007年2月20日《宝安日报》在“找工作靠父母，就业还有没有公平”文章中提出了“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的观点。文章说：家庭背景不同，导致子女找工作冷暖不均。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父亲的能力决定了孩子的工作，现在不是孩子找工作，更多的是父亲在找工作，“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宝安日报, 2007)。

(六) 在Baidu门户网站上，以“找工作靠关系”作为关键词搜索，出现相关网页约21 100 000篇文章；在Google门户网站上，以“找工作靠关系”作为关键词搜索，出现相关网页约25 700 000篇文章。这些文章通过对大学生或者相关专家的调查、采访，得出的结论都是有相当多数的人认为先赋性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有相当的影响。

目前，大众传媒目前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意大众传媒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渗透力、影响力越来越强，其对人们认识和观念形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媒介通过描述说明而提出的对现实的解释有着潜移默化其受众的作用。人们可以从所读到、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发展出对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及共认的意义构想”(德弗勒、鲍尔, 1990: 42) 随着人们对从大众传播媒介

^① http://www.eol.cn/kuai_xun_4343/20080619/t20080619_303508.shtml。

^② <http://www.myxhw.com/content/2007-7/17/200671795120.htm>。

中获取信息的依赖性增加，其所建构的各种“社会现实”，即“媒介现实”，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受众头脑中的社会现实。“‘媒介现实’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来源”，人们“以事物的感知、判断及所采取的行动，大都以他们看到、听到的媒介现实为依据”（张国良，2001：63）。目前大众传媒关于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作用的报道形成了独有的“媒介现实”，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中“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一影像。

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真如大众传媒报道一样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再来看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

二、学界研究：先赋性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的作用有限

社会学对职业地位获得的经典研究当属布劳（Blau, P. M）和邓肯（Duncan, O. D）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书中所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式”。他们以“16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为先赋性变量（继承性因素），以被访问者（年龄在20-64岁的男性，N=20700）获得的“受教育水平”、“初职职业地位”和“目前职业地位”为自获性变量（后致性因素），用社会经济指数量化了父亲与被访问者本人的职业地位，以路径分析递归模型计算各个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目前职业地位”的影响。文章研究结论是：对初职获得者而言，本人教育和家庭背景都有作用，其中本人教育作用更大；对于现职获得者而言，本人的教育和初职的作用较大，但本人教育是最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布劳、邓肯将他们的研究结论推广为：越是工业化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越弱；越是传统型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越强（Beeghley, 1996：70）。这一关于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研究的方法、路径和结论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中国人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研究首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白威廉（William Parish）。白威廉通过对中国大陆1972-1978年间迁居香港的132位移民的访谈，得到了他们的2865位邻居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对于那些在“文革”前（1966年前）就年满20岁的同期群案例来说，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地位”与“阶级出身”对子女的“职业地位”获得等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作用；但对于那些在“文革”时期才年满20岁的同期群案例来说，两者之间的作用却并不显著（Parish, 1984：84-12）。

谢文和林南1983年在北京的调查、林南和边燕杰1985年在天津的调查数据证实：父亲的职业地位既对人们的初职地位获得毫无影响，也对人们目前职业地位的获得缺少明显作用（林南、边燕杰，2002：83-115）。

蔡禾、冯华通过对广州市劳动人口职业（年龄介于18-65岁之间，N=383，其中男性、女性分别占40.7%、59.3%；51岁以上占15.1%、36-50岁的占52.2%、35岁及以下的占32.6%；小学文化以下占9.2%、初中占18.7%、高中占45.5%和大学以上占26.6%）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发现：本人教育程度对获取最初职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现职获得则是教育程度和初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初职起了主要作用。先赋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也对职业获得起一定的作用。教育获得受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最大，是家庭文化资本传承的表现（蔡禾、冯华，2003）。

范成杰根据对杭州市青年（年龄介于17-35岁之间，N=698）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城市青年初始职业获得情况。发现：（1）杭州市青年的先赋性因素对其初

始职业获得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本人的文化程度对获得初始职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2）先赋性因素对杭州市青年的教育获得的影响虽然还没有消失，但是其影响有限（范成杰，2004）。

虽然较多的学者研究发现先赋性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作用有限，但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先赋性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有一定的作用。这也成为一些大众传媒关于先赋性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发挥关键作用“媒介现实”的佐证材料。张翼以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他发现：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型社会；但“父亲职业地位”仍然具有影响力，即“先赋性因素具有显著性”。（张翼，2004）有学者通过对大学生的个案访谈，探讨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机制。其结论为：社会资本是就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工具，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促进了信息的流通和新的关系网络的建立。先赋地位越好，学生越可能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相对于自致性社会资本而言，先赋性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帮助大学生删选就业信息；提高大学生就业概率和质量；有利于大学生节约求职成本（张少平，2009）。

学界研究可以归纳为：先赋性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有限。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是一种以经验的方式，对社会世界中人们的行为、态度、关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产物所进行的科学的探究活动。相对于大众传媒的报道而言，作为一种科学探究活动的社会研究，比起常识、传统、权威、个人经验以及其他一些知识来源来说，无疑具有更高的系统性、结构性、组织性及科学性；尽管它所产生的知识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但其存在缺陷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因而这种知识也更为可靠一些（风笑天，2005：2）。

三、先赋性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的经验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介绍

作为一项经验研究，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2009年下半年对河北省S大学即将毕业的大四年级学生的职业获得情况所作的抽样调查。调查样本按照多阶段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先从S大学按照学科性质抽取文科、理科、工科学院，再从学院随机抽取班级，后从班级中简单随机抽取样本（样本频数及百分比见表1）。本次调查共发放650份问卷，回收问卷587份，有效问卷为557份，分别为90.3%、85.7%。在557份样本中，男性占83.8%，女性占16.2%。

本次问卷调查中所设计的先赋性社会资本情况，即协变量包括：

1、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为了使不同被访问者有一个同样可以被社会接受的准则来度量其“受教育状况”，本文选择使用被访问者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这个变量。本文将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定义分别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学、研究生及以上。

2、父、母亲职业阶层。本文参考冈索普（J. H. Goldthorpe）关于职业分类框架而设定的职业阶层序列，将职业阶层由低到高依次定义为：无业/农民、工人、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军警、个体户/商人/自由职业者、企业家/企业者/其它。

3、父、母亲最高行政级别。分别为：无行政职务、无法分类部门负责人、企业/非公经济部门负责人、事业单位负责人、党政部门负责人、国家机关部门负责人。

4、父、母最高行政级别。分别为：股级/科/局、县处级、地厅级及以上。

5、家庭年总收入。分别为：5000 元及以下、5001-15000 元、15001-30000 元、30001 元-60000 元、60001-100000 元、100000 元及以上。

表 1：样本频数及百分比

分类	子类型	频数	%	分类	子类型	频数	%
性别	男	467	83.8	生源	农村	145	26.0
	女	89	16.0		城镇	412	74.0
前途选择	就业	437	78.5	求职信心	有信心	333	59.8
	深造	88	15.8		一般	204	36.6
	不就业	32	5.7		没有	17	3.1
期望就业单位	党政机关	97	17.4	父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224	40.2
	企业	314	56.4		高中	228	40.9
	事业单位	99	17.8		大学	97	17.4
	其它	47	8.4		研究生及以上	8	1.4
期望月薪	1000元及以下	7	1.3	父亲职业阶层	无业/农民	237	42.5
	1001-1500元	70	12.6		工人	92	16.5
	1501-2000元	207	37.2		干部	82	14.7
	2001-2500元	122	21.9		专业技术人员/军警	38	6.8
	2501-3000元	58	10.4		个体户/商人/自由职业者	81	14.5
	3000元以上	93	16.7		企业家/企业者/其它	26	4.7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320		57.5	父母最高行政级别	无行政级别
	高中	162	29.1	股级/科/局	97		17.4
	大学	69	12.4	县处级	23		4.1
	研究生及以上	6	1.1	地厅级	13		2.3
母亲职业阶层	无业/农民	312	56.0	家庭年总收入	5000元及以下	89	16.0
	工人	69	12.4		5001-15000元	182	32.7
	干部	43	7.7		15001-30000元	126	22.6
	专业技术人员/军警	38	6.8		30001-60000元	83	14.9
	个体户/商人/自由职业者	71	12.7		60000-100000元	48	8.6
	企业家/企业者/其它	23	4.1	100000元及以上	29	5.2	
父母最高职务	国家机关部门负责人	35	6.3	工作落实情况	未落实	261	46.9
	党群部门负责人	44	7.9		已落实	296	53.1
	事业单位负责人	63	11.3	努力程度	不努力	59	10.6
	企业/非公经济部门负责人	63	11.3		比较努力	348	62.5
	无法分类部门负责人	152	27.3		很努力	150	26.9
	无行政职务	200	35.9				

模型的因变量为工作落实情况，分别为未落实、已落实。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生源地、前途选择、期望就业单位、期望月薪、求职信心、努力程度以及求职费用。

求职费用为自填式内容，介于 5-10000 元之间，均值 (Mean) 为 857.37，中位数 (Median) 为 300.00，标准差 (Std. Deviation) 为 1382.752。

为了测量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的影响，本文使用 SPSS17.0 的二分逻辑斯蒂克回归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二) 主要研究结果

1、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表 2 是大学生的职业获得与先赋性资本之间的相关系数。我们主要考察大学生职业获得与先赋性资本 (包括：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父、母亲职业阶层，父、母亲最高行政级别，父、母最高行政级别，家庭年总收入) 与工作落实情况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工作落实情况与他们父亲学历、父亲职业、母亲学历、母亲职业、父母最高职务、父母最高行政级别以及家庭年总收入等之间的 Spearman's rho 等级相关系数分别为 -0.019、0.020、0.023、0.019、0.014、0.002、0.038；大学生的工作落实情况和他们的先赋性资本之间的 Kendall's tau_b 相关系数分别为 -0.018、0.019、0.022、0.017、0.013、0.002、0.034。两种分析方法等级相关系数表明，大学生的工作落实情况和他们的先赋性资本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表2：大学生的职业获得与先赋性资本的相关系数矩阵

		父亲 学历	父亲 职业	母亲 学历	母亲 职业	父母最 高职务	父母最高 行政级别	家庭年 总收入
Spearman's rho	工作落实情况 Correlation	-.019	.020	.023	.019	.014	.002	.038
	Sig. (2-tailed)	.651	.630	.592	.663	.739	.955	.369
Kendall's tau_b	工作落实情况 Correlation	-.018	.019	.022	.017	.013	.002	.034
	Sig. (2-tailed)	.651	.630	.591	.663	.739	.955	.368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2、变量间的二分逻辑斯蒂克回归模型

以求职大学生的先赋性资本 (包括：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父、母亲职业阶层，父、母亲最高行政级别，父、母最高行政级别，家庭年总收入) 为协变量，以工作落实情况为因变量进行变量间的二分逻辑斯蒂克回归分析。

表 3 给出了模型拟合优度评价结果的几个统计量。Cox & Snell R Square 统计量和 Nagelkerke R Square 统计量分别为 0.002、0.003，意味着模型只能解释被解释量 3.0%左右的变动。

表 3: 模型拟合优度评价结果

Model Summary

Step	-2 Log likelihood	Cox & Snell R Square	Nagelkerke R Square
1	765.559 ^a	.002	.003

a. Estimation terminated at iteration number 3 because parameter estimates changed by less than .001.

表 4 是二分逻辑回归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包括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标准误、Wald χ^2 、自由度、Sig 值以及 OR 值 (即 $\text{Exp}(B)$)。可以看出, 大学生的职业获得与父、母亲受教育程度, 父、母亲职业, 父、母亲最高行政级别, 父、母最高行政级别, 家庭年总收入等先赋性资本的 β 系数分别为 -0.091、0.010、0.005、0.024、-0.023、-0.091、0.042, 非常小。这说明先赋性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虽然有一定的影响, 但解释力不强。

表4: 回归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B	S.E.	Wald	df	Sig.	Exp(B)
Step 1 ^a 父亲学历	-.091	.163	.313	1	.576	.913
父亲职业	.010	.071	.021	1	.884	1.011
母亲学历	.005	.179	.001	1	.978	1.005
母亲职业	.024	.076	.101	1	.750	1.024
父母最高职务	-.023	.071	.107	1	.744	.977
父母最高行政级别	-.091	.162	.313	1	.576	.913
家庭年总收入	.042	.074	.332	1	.565	1.043
Constant	.316	.570	.307	1	.579	1.371

a. Variable(s) entered on step 1: 父亲学历, 父亲职业, 母亲学历, 母亲职业, 父母最高职务, 父母最高行政级别, 家庭年总收入。

由此建立的回归模型为:

(1) 职业获得概率的指数 $Z=0.316-0.091*\text{父亲学历}+0.010*\text{父亲职业}+0.005*\text{母亲学历}+0.024*\text{母亲职业}-0.023*\text{父母最高职务}-0.091*\text{父母最高行政级别}+0.042*\text{家庭年总收入}$ 。

(2) 职业获得的概率为: $\text{Prob}(Z)=1/(1+e^{-Z})$ 。

在通常情况下, $\text{Prob}(Z) < 0.5$ 时, 可预测到某事件不发生; $\text{Prob}(Z) > 0.5$ 时, 可预测到某事件可发生。

例一：一位大学生的先赋性社会资本情况为：（1）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2）父、母亲职业阶层为无业/农民，（3）父、母亲最高行政级别为无行政职务，（4）父、母最高行政级别为股级/科/局，（5）家庭年总收入为 5000 元及以下。

（1）职业获得概率的指数=0.316-0.091+0.010+0.005+0.024-0.023-0.091+0.042=0.192。

（2）职业获得的概率为： $\text{Prob}(Z)=1/(1+e^{-0.192})=0.284$ 。

上式 $\text{Prob}(Z)=0.284 < 0.5$ 时，可预测到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这一事件不发生。

例二：另有一位一位大学生的先赋性社会资本情况为：（1）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2）父、母亲职业阶层为企业家/企业者/其它，（3）父、母亲最高行政级别为国家机关部门负责人，（4）父、母最高行政级别为地厅级，（5）家庭年总收入为 100000 元及以上。

（1）职业获得概率的指数=0.316-0.091*4+0.010*4+0.005*4+0.024*4-0.023*6-0.091*6+0.042*6=-0.324。

（2）职业获得的概率为： $\text{Prob}(Z)=1/(1+e^{-0.192})=0.425$ 。

上式 $\text{Prob}(Z)=0.425 < 0.5$ 时，也可预测到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这一事件不发生。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测到最好和最差的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这一事件都不发生。

四、几点结论

（一）本研究通过对 557 份关于大学生职业获得与他们先赋性资本的调查数据的分析，结论表明先赋性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解释力不强。这一结论与学术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但与大众传媒关于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作用报道所形成的独有的“媒介现实”相差较大。个中原因和大众传媒、学术研究的特点有很大的关联性。

商品经济时代，大众传媒无可避免地要打上鲜明的商品烙印。“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鲍德里亚，2002：225）它的生产者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必须要迎合消费者的要求；因此，在形式上以夸张的手法制造卖点来吸引观众眼球。目前，大众传媒关于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作用的报道形成了独有的“媒介现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原因。而作为具有更高的系统性、结构性、组织性及科学性的学术研究，它是基于对数据、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说服力更强一些。

（二）虽然先赋性社会资本在大学生职业获得的过程中的作用有限，但其作用还是存在的。特别的，研究发现在所有的先赋性社会资本变量中，母亲学历、职业对大学生职业获得的解释力要高于其它变量（见表 4）。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文化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认同。而在家庭中，由于母亲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较多，对孩子影响较大。有调查显示，在半数以上的城市家庭中，母亲是子女在家庭中接触最多的人。子女在家庭中更经常与母亲交谈，他们与母亲的关系明显要强于他们与父亲的关系（风笑天，2002）。

(三) 如果以努力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父、母亲受教育程度, 父, 母亲职业, 父、母亲最高行政级别, 父、母最高行政级别, 家庭年总收入等先赋性资本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82、0.000、0.365、0.089、-0.345、0.104、-0.079 (见表5), 也就是说, 先赋性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的解释力增强一些。这也说明, 在职业获得的过程中, 自致性社会资本比先赋性资本发挥的作用要大一些。这与布劳、邓肯提出的“越是工业化社会, 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弱; 越是传统型社会, 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强”的结论是一致的 (Beeghley, 1996: 70)。这一结论说明, 在现代社会个人的成功主要还是靠后天的努力。

表5: 回归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以努力程度为控制变量)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B	S.E.	Wald	df	Sig.	Exp(B)
Step 1 ^a 父亲学历	-.182	.350	.271	1	.602	.833
父亲职业	.000	.163	.000	1	.999	1.000
母亲学历	-.365	.404	.817	1	.366	.694
母亲职业	.089	.172	.271	1	.603	1.094
父母最高职务	-.345	.146	5.601	1	.018	.709
父母最高行政级别	.104	.319	.107	1	.744	1.110
家庭年总收入	-.079	.148	.282	1	.595	.924
Constant	2.868	1.163	6.083	1	.014	17.600

a. Variable(s) entered on step 1: 父亲学历, 父亲职业, 母亲学历, 母亲职业, 父母最高职务, 父母最高行政级别, 家庭年总收入。

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 但人生道路可以选择! 目前, 在职业获取过程中的大学生们, 与其责怨自己先赋性社会资本不足, 不如静下心来, 踏踏实实夯实自己的后致性社会资本, 同样也有灿烂的未来。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有一句警言: “自立就是滴自己的血, 淌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靠天靠地靠祖上, 不算是好汉!” 就以此句警言作为本文的结语。

参考文献:

- 宝安日报, 2007, 《找工作靠父母, 就业还有没有公平》, 2007年2月20日。
- 鲍德里亚, 2002, 《消费社会》, 刘成富、全志刚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 蔡禾、冯华, 2003, 《广州市劳动人口职业获得分析——兼析教育获得》, 《中山大学学报》2期。
- 范成杰, 2004, 《城市青年初始职业获得及机制》, 《社会》第4期。
- 风笑天: 2005, 《社会学研究方法》,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2002, 《城市中学生与父母的关系: 不同视角中的图像》, 《青年研究》第8期。
- 黄进、徐锐, 2007, 《六成研究生认为就业靠关系》, 《江南时报》2007年5月31日, 科尔曼, 1990, 《社会理论的基础》, 邓方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斌, 2005, 《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 》, 《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1日。

林南、边燕杰, 2002, 《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北京: 三联书店。

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 1990, 《大众传播学诸论》, 杜立平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周玉, 2005, 《干部职业地位获得的社会资本分析》,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国良, 2001, 《媒介与社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翼, 2004, 《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 《社会学研究》第4期。

张少平, 2009, 《先赋性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及局限》, 《高校辅导员学刊》第2期。

Beeghley, Leonard, 1996,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yn and Bacon.

Lin. Nan, Walter M. Ensel, and John C. Vaughn. 1981.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Parish William, L.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 by J.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汤兆云, 博士,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2009年进站博士后。